新阶段中国雄起应更有“开放自信”

■ 杨 帆

在我看来,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引进外资为象征性节点,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从全方位对外开放走向“相互开放与融合”,深度介入国际游戏规则。

开放新阶段中我们的历史任务是:首先,把对外投资作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战略核心是通过集群式的国际生产一体化,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国际资源,从资源导向型投资以及单一生产的“点式投资”升级为“链式投资”。

其次,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张新王牌,构建东西两半球、一个轴心的全球化贸易新体制。而这些基本都是想把中国和金砖国家排除在外。

国际游戏规则、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200年来的历史短板。既然不能绕过就应积极参与,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快与东亚经济体区域合作,与美国进行双边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合作。

另外,还要积极进行上海自贸区实验,推动国内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先出境到周边国家,实现亚洲化。

随着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美国担心中国的不确定性,周边国家对中国一疑虑二害怕;而中国则担心

在开放中被西方颠覆。但我认为,在开放新阶段,我们更应该有“开放自信”,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基本国力空前强大,走上历史性新台阶。根据统计,1949年中国经济为世界5%;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比重11%。预计2020年左右中国GDP为世界第一,比重25%以上。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文德的预测,中国2030年GDP为美国的两倍,贸易额达四倍,在资本净输出值与净债权方面将确立金融优势。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为美国四分之一左右,2030年将到二分之一。他的估计可能过分,但中国崛起的态势确实非常明显,未来肯定会重塑亚洲与世界格局。

第二,由于庞大人口、市场规模和国家实力,任何像样的全球和亚太协定,都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遏制中国不能奏效。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规则,就不是全球性的。只要参与,中国就能影响游戏规则。

加入WTO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不怕自由贸易,倒是西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规模效益,可容纳全球产业链,应用新技术成本低,可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第三,中国文化有开放性,可与外来文化融合,保留传统优势。中国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传下来的唯一象形文字,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原曾导致天下大乱,北方游牧民族几次灭亡汉族政权,但中原文化最终吸收外来文化,给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如此,目前开放已不是单方面模仿,而是相互开放和融合。

30年前中国曾盛行“赶上国际最后一班车”之说,使我们具有紧迫感。其实并没有什么最后一班车,国际竞争永远存在。新的开放对中国的最大机遇是:以后发优势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促进国内改革深化,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在崛起过程中重新确认中美新的大国关系,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核心国家,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反垄断 不容半途而废

■ 丁华杰

“外资车企通过垄断投资从中国市场捞到了很多‘不义之财’,希望国家不要一阵风,一定要将反垄断坚持下去。”原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在日前举办的2014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的话掷地有声。

连日来,包括何部长以及诸多人士都谈到了反垄断要持久,要长效化,长效监管才能够避免这些企业犯同样的错误,才能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从冤大头的身份脱离出来。事实上也是,关于汽车行业反垄断的事情,不在于罚款多少、不在于罚了外企还是自主企业、不在于罚几次、不在于罚多久,而是要清楚为什么这些企业能够形成垄断,什么样的土壤培育这个垄断,从土壤上面根除才有可能彻底破除垄断。

所以,如果这些汽车行业反垄断,应该彻底一些,这个彻底的角度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商的调研,还包括多个方面,因为汽车行业的垄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汽车业反垄断?具体发掘、深挖一下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规则制定者有没有问题。正如我们谈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解聘相关人员的情况,我们要防止利益共同体从规则上设置障碍,不过媒体报道中这些人是否拿了相应的不该拿的资金,我们有理由去质疑规则决策者的动机,因为市场的不健康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应该去审慎行事。

规则本身有没有问题。单纯看一个规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没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没有问题,“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没有问题,几者之间联合起来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如何变更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如果规则之间出现了问题,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不好,解决起来事倍功半。目前来看,前期工商总局推出监管“汽车授权备案”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感知到,对于问题至少已经意识到了。

规则的执行有没有问题。如果规则修正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规则的执行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质疑呢?正如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多年或者十多年,当下才进行约谈、调研,显得太过于缓慢了,是这些监管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审查吗?还是半推半就地姑且养奸了?如果对于一些汽车制造商真的能够罚款数以亿计人民币,就说明它产生了极其大的危害,这个时候来讲,相关的负责人是否应该出来表态、引咎辞职呢?所以,如果只有规则,没有监管和惩罚,这个规则就是一片废纸。

参与方,包括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有没有问题。有人说此次反垄断瞄准了PDI检测费,意味着以售后服务为主要的反垄断方向。不过清晰一点,翻开各家账本,你会发现这个杂费很普遍,甚至致电4S店,销售顾问都毫不顾忌,这些对于消费者来讲,属于霸王条款,我们不能因为购买一辆车去打官司,这个时候谁来保障限制类似的乱收费,还有更为严重的加价提车现象,不正之风需要肃清。

反垄断需要给美好的事物扫清障碍,所以归根究底来讲,“反垄断”目的是变革不合理规则及强化监管执行力度,让市场整体上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自身长久健康发展,罚款只是一种皮毛的手段,而不应该是终点。

笔者还是秉持以往的观点,要么你什么都别做,让汽车制造商在现有市场规则下生存竞争,要么你就彻底变革规则,带来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规则,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的行业获得快速发展,否则的话,煮半开的水甚至比生水和开水都要差,甚至对身体都是有害的,望鉴之。

“月饼福利” 也需要边界清晰

■ 管鑫

对于月饼等福利,以反腐之名管制或许只能治标,还容易引发争议。根本办法,还是要通过预算制度的推进,通过公职人员工资与福利制度的细化、完善与透明,改变当前福利发放过于模糊和随意的现状。

中秋节,月饼这个“民俗”点心再度成为舆论空间的“主角”。和往年多数批评“奢华月饼”不同,今年多了不少抱怨“没月饼”的声音。因为反腐的推进,很多单位取消了发放月饼的“传统”,让一些人感到很不适应,有媒体甚至称:一些执行者在借反腐之名拿掉老百姓应有的职工福利。

防止“腐败月饼”的出现,是今年中秋前后反腐的一个重点。日前中纪委公布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例中,就有20人因违规发放月饼、福利、补贴等行为遭到处分。对一块小小月饼如此严防死守,难免会遭到一些不理解,毕竟对于多数基层职工而言,中秋节从单位领盒月饼是“传统”,似乎很难和腐败联系起来。

但过去的教训证明,“借职工福利之名行腐败之实”,远比“借反腐之名拿掉老百姓应有的职工福利”更值得担忧。因为对机关事业单位等福利管理的不到位,一旦普遍承认发月饼的正当性,月饼的“含金量”就很难掌控,过去花样不断翻新的“天价月饼”“腐败月饼”就是明证。

“月饼”虽然是民俗,但是,其能否成为财政供养人员的福利,还是需要清晰的边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如果是私营企业,不管多少钱的月饼,都发在明处,就不会有多少非议。可是对很多机关、事业单位来说,过去发月饼或月饼券,是当成一项“隐性福利”,或者标准远超常理,或者账务不透明。有些经济状况好的单位或者职位高的领导,往往借此大捞一笔。对这些不能纳入正当福利规范管理的,取消本是一种必然。

所以,反腐反的是“腐利”,而不是职工的正当福利。其实就算单位不发月饼,对职工的福利影响也有限,真想吃月饼,去超市买几块,花不了多少钱。相比之下,腐败少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相信明智的人,不会因为单位少发几块月饼,就觉得反腐已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这样的声音,可能反是遂了那些对反腐心存忌惮的人的意。

从这个角度说,月饼所引发的福利之争,印证了取消既得福利的复杂和困难。福利政策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福利刚性”,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接受上升不能接受下降的心理预期。尽管月饼不值多少钱,可当既得福利被取消,人难免会有不适应。普通职工如此,那些隐性福利的更大既得利益者,当然更是如此。

一项福利的存在,总会有各种理由做支撑,发月饼是一种民俗,发各种节日券,当然也能找到相应说法。而对这些或大或小的福利,以反腐之名管制或许只能治标,还容易引发争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通过预算制度的推进,通过公职人员工资与福利制度的细化、完善与透明,改变当前福利发放过于模糊和随意的现状。月饼发在明处、发得合法合理,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

排污沙漠腹地, 责任可别“荒漠”

■ 新京

是时候以“刮骨疗伤”之法对腾格里沙漠治污了。不能因其处在沙漠地带,就放松监管,任其成污染肆虐的“无人区”。

据新京报报道,因化工企业将污水直接排入沙漠,在内蒙古与宁夏接壤处的腾格里沙漠,也是中国第四大沙漠的腹地,出现了巨大的污水坑,记者日前在现场看到,该坑被插着不少排污管道,下面是黑色泥浆般的凝结物,发出一股恶臭味。遭曝光后,当地有关方面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和整改。

腾格里沙漠腹地,原本被誉为“像天一样浩渺洁净”的地方,可如今却出现巨型排污池,植被与水资源面临灭顶之灾,牧民不堪其“污”,堪称“沙漠之殇”。据了解,为防范外人接近排污点,涉事化工园区还安排了巡逻队。违规排污,已然变成煞费苦心的污染攻坚战,这似乎也印证了那句“鞭长莫及”的话。

实质上,这不是腾格里沙漠污染首次遭曝光。早在2010年,就有媒体曝光了宁夏一造纸厂将造纸污水排向腾格里沙漠事件。此后4年间,该工业园区污染问题屡遭披露。如2012年,央视曾对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违规生产进行过曝光,随后15家企业停产,另6家有污染预处理设备的企业仍可生产。或许正是如此,国家环保部在2014年初,还把内蒙古环保厅对腾格里化工园区的监督整改举措向全国通报。

但现在看来,这么明显的污水坑堂而皇之地存在,许多牧民正在沦为“环境难民”,这也让人怀疑:整改之后,为什么之前屡被曝光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当地官方承认“可能监管不到位”,不到位是因对“污水坑”这明摆着的污染凭证未能实时“监测”出来,还是发现了疏于治理?而今介入调查,是否是“媒治”效应下的后知后觉?

当然,污水坑是之前排污留下的“历史问题”,还是整改后的“新病”,还有待调查,但无论如何,问题就摆在那,必须及早予以治理,如果查证后发现还有企业违规排污,更是应严厉溯责。

应注意到,尽管眼下“唯GDP论”随着政绩观矫枉而退烧,可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对污染的容忍度仍很高,“环保经济排序”也是扭曲的。有些企业减污不到位、环保不达标,也毫发无损。在沙漠地带,哪怕“沙漠地下水污染后不可能修复”,可有些部门、官员的“责任荒漠化”,却构成一些企业排污的盾牌。

这无疑令人遗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明确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还可能被究刑责。而明年将实施的新《环保法》,也规定将对污染企业按日连续计罚等。可在腾格里沙漠,这“天”大的污水坑,却成了一块疮痂,成了对当地有关部门、企业践履环保责任不力的叩问。

是时候以“刮骨疗伤”之法对腾格里沙漠治污了。对超标排污企业、监管不力的部门追责,只是“向污染宣战”的题中之义,更重要的,则是让环境监管对应约束落到实处,让“重典”真正起到震慑作用。也只有这样,沙漠才不会成污染肆虐的“无人区”,环保的呼声溅起的才不会是“污水坑”里的那一道道泥污水印。

薪酬改革 不仅为净化央企

■ 叶青

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引起较大的关注。我认为,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来得太晚了!它应该伴随着国企改革的始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体系中,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净化国企。

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在国企内部,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同样很明显。第一财经研究院、尚道管理咨询公司等机构曾经共同推出

《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薪酬榜》,显示2011年不同行业总经理的平均薪酬可以相差6倍。39家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中,有34家上市公司的老总收入高于百万,其中收入最低的中国人寿执行董事、总裁万峰,其年度薪酬达到60.78万元,而收入最高的则是中国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度薪酬总额为988.47万元。且不说董事长与员工收入的差距,就是董事长之间也有如此大的差距。此次薪酬改革规定最高不超过60万,多多少少有约束作用。

有利于打击国企腐败。在高薪酬之外,还有国企之间相差颇大的职务消费。特别是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占到职务消费的大头。此次薪酬改革中也规定,取消薪酬之外的高职务消费。由于产权问题,国企客观上存在腐败的因素。国企由国家一手投资,受托的高管不是国企的主人,因此,增加待遇所带来的国企成本提高,不是高管们要考虑的问题。此次把薪酬分为三部分,有利于把高管的利益与国企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有利于发展健康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13年底,全国国企资产总额达到104.1万亿元。要想把这么多的资产盘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国资委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四个层次。此轮国企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一混二卖”。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以出卖国企股份为辅。如果国企负责人还是拿高倍薪酬、享受“职务消费”,民营企业又怎么敢“混”进来呢?

央企负责人对待薪酬的态度,可以视为试金石。如果认为薪酬太低,没有体现自己高水平的价值,确实可以离开国企。国企负责人既不是纯粹的党政干部,也不是纯粹的企业家。位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与民营企业家之间。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同样也会涉及依法治企,首先要做的就是依法治官——国企中的高管。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企业走出去 要学会利用国外传媒

■ 秦海峰

“首届长江公共外交高峰论坛”8月31日下午在江西九江闭会,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会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利用国外的媒体,多和国外的媒体主动接触,不能怕媒体。

赵启正说,公共外交要注重效果,我们说出去的话,对方可能不能正确理解,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我们自己没做好,二是没要按照对方的语境和思维方式说话,导致沟通上出现障碍,所以,我们在搞公共外交时要注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不能自说自话。

“公共外交使用的语言或词汇,应该在对方的文化范围内,在对方能够理解的范畴内,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基本功。”赵启正表示。

在回答中国企业如何更好走出去和传媒关系的问题时,赵启正表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中,懂得怎么样利用国外传媒是很重要的。同样,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要要学会利用国外的媒体,多和国外的媒体主动接触,不能怕媒体。

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企业的任何行为说到底都是人的行为,在回答记者关于对走出去的企业在人才培养和选择方面的建议时,赵启正说,很多企业家缺乏走出去的经验,因此要培养懂得如何走出去的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要内懂国情,也要外知世界。

“企业‘走出去’的人才,不仅要熟悉当地的法律,更要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法律是有条文的,风土人情没有文字,对人才的要求也比较高。风土人情是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一样。”赵启正表示。